

构建博物馆观众研究、展览与教育实践共同体： 来自长沙博物馆“哇哦博物馆”展览的启示*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Community Among Visitor Studies, Exhibitio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Museums:

A Case Study on *Wow Museum* Exhibition in Changsha Museum

季娇¹ 刘晴贤² 吴婉² 陈子慧² 苑瑞³

Ji Jiao¹ Liu Qingxian² Wu Wan² Chen Zihui² Yuan Rui³

(1.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沙, 410083; 2. 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 长沙, 410000;
3.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 吉首, 416011)

(1.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2. Depart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Changsha Museum, Changsha, 410000; 3.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Center of Xiangxi Tujiazu and Miaozi Autonomous Prefecture, Jishou, 416011)

内容提要：在博物馆，观众是展览与教育的共同服务对象，观众研究为博物馆提供理解观众的窗口。展览为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使命提供了载体，教育实践为活化博物馆展览、加强博物馆履行社会使命提供了路径。因此，博物馆可以以观众研究为媒介，构建研究、展览和教育实践共同体，助力博物馆工作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选取长沙博物馆“哇哦博物馆”儿童展览为实践场域，通过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合作开展一项以儿童观众提问为对象的观众研究，探索以观众研究为基础促进博物馆展览和教育工作发展的有效模式。在研究过程中，团队成员利用讨论、对话、互动、反思、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分析观众研究对具体展览与教育实践工作的启示，探索依托观众研究促进展览教育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模式。

关键词：展教合一 观众研究 实践共同体 专业化

Abstract: Museum exhibitions are the foundation of museum to fulfill the social value, and museum educational practices create interactive opportunities to support museum exhibition development. In this case, we conducted a visitor study as a media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ng exhibition development and museum education work. Specifically, we analyzed children's questions from the worksheet in *Wow Museum* exhibition, as a way to reflect and innovate museum work practices, and understand how exhibition development, museum education work, and visitor studies ar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influenced. This study

*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博物馆研究中心博物馆研究网络“儿童观众研究”联合课题部分成果。

may contribute to offering directions for Chinese museum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work community in museums, and further facilitate museums running in a sustainable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

Key Words: Collaboration between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visitor studie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s; professionalization

2021年，中宣部联合国家文物局等多家单位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展陈质量与发挥教育功能均是夯实博物馆发展基础、提升服务效能的重要方向。陆建松提出，“博物馆展览是一个基于传播学和教育学的，集学术文化、思想知识和审美于一体的，面向大众的思想观点、知识信息、文化艺术和价值情感的传播载体”^[1]。博物馆展览与教育工作应该具有融合性，协同发展。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国内外均存在的一个普遍现状是许多机构的策展人、研究人员与教育人员之间缺乏合作，教育人员的地位、角色和作用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视^[2-3]。正如郑奕指出，这种现象在我国博物馆界尤为严重，具体表现为：博物馆人不能意识到展览团队的构成需要具有科学性和多元性，同时教育工作者在展览开发过程中明显缺位^[2]。由此造成盘活静态展览的博物馆教育活动无法配套展览，展览中的重点、亮点可能难以在观众群体中得到同频共振。

我们认为，博物馆工作应该借鉴实践共同体理论，寻找展览与教育工作的有效媒介，促进展览教育工作的协同发展。在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中，展览是为了服务观众，教育也是为了服务观众。由此看来，观众是展览教育工作的

共同服务对象，也成为联结展览与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开展观众研究、形成对观众的一致性理解可以成为促进展览教育工作协同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在现实中，博物馆工作者面临繁重的一线工作，缺乏时间、精力和技术开展观众研究，故而本文拟介绍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如何融合高校研究力量来开展观众研究，以促进展览、教育、研究共融发展的过程。在该案例中，以儿童在参观完“哇哦 博物馆”展览后的提问为研究对象，承担展览教育的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合作开展研究。具体而言，馆校双方共享研究数据，共同分析儿童提问的种类和特征，并理解研究结果对具体展览和配套教育实践的启发性，进一步探索博物馆以观众研究为展览教育的纽带，构建使展览具有可持续性、促进展教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合作型工作模式。

一、理论基础

实践共同体由西方学者珍妮·拉弗（Jean Lave）和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提出，该理论起源于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习流派^[4]。珍妮·拉弗和埃蒂纳·温格通过对助产士、裁缝、舵手、屠夫等各个行业群体进行研究，发现群体成员可以在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学徒制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等方式来共同学习，建立社会网络，形成专业语言，促进专业发展。其中，实践共同体是指“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个体、活动、世界之间形成的一系列关系”^[4]。身处实践共同体中的个体能够针对一个主题进行观点、问题、信息和创意的分享，通过与他人互动提升个体的专业能力。这种学习模式运用于工作实践，能够让工作实践具有集体性、合作性和社会性。

埃蒂纳·温格认为，并非所有的社群都可以称为实践共同体，一个实践共同体需要包含三个重要的元素：领域、社

群和实践^[5]。领域性表明,实践共同体中的成员需要通过共通的兴趣、能力、专业素养形成对领域的认同感。这是对共同体成员权益和领域专业性的基本保障。社群性表明成员需要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劳动,在社群中,他们共同建立工作网络、关系网络,共享信息,与他人互动。这是促进实践共同体成员形成归属感、责任感和承诺感的环境基础。实践性表明成员之间不仅具有相似的兴趣,同时需要通过社会互动创造、形成和使用工具。这种工具不仅包含实体产品,也包含语言、规则、习俗、社会规范、群体记忆等非实体性内容。这是促进实践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

实践共同体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从学习理论的视角来审视职场工作和行业发展,也就是说,工作不应该被简单看作一份个体运用已有知识完成任务的过程。相反,开展每一份工作都应该置身于一个具有真实情境的“实践场”^[6]中,从业者通过共同实践学习的方式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进程和个体的专业成长。那么,在学习的视角中,工作就具有了可持续性,具有了促进个体和行业成长的功能。

目前,实践共同体理论在成人教育、职场学习、组织管理、员工专业发展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7-8]。在我国,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学校教师群体,探索不同背景的教师群体如何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学习实践方式来形成共同体,推进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9-11]。目前,在博物馆领域,国际博物馆行业,如美国在探索博物馆教育工作专业化问题上对实践共同体理论的运用较为广泛。在该理论的指引下,策

展人、教育人员和高校研究者尝试合作,通过对话、互动和交流,进而发现展教工作的共同性价值目标,鉴别并解决彼此工作的实际困难,打破行政壁垒,相互促进,共同成长,以达成“以观众为中心”的展教研协同发展体系。其中,Doris Ash等人通过运用实践共同体理论开展观众研究,为博物馆工作实践提供指引,同时为促进博物馆教育专业化发展提供支持^[12-17]。相较而言,实践共同体理论在中国博物馆展教实践中运用不多^[18]。中西方博物馆身处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展教工作协同发展面临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将西方已经相对完善的展教协作机制“移植”到中国博物馆工作情境中存在较大的管理问题和文化风险。但是,基于国内外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已有研究推论,实践共同体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对我国构建本土化的博物馆展教协作机制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效力^[19]。

我们借鉴实践共同体理论,以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为研究情境,博物馆的展览教育工作者和高校的研究者共同设计研究框架,分析儿童参观展览后的提问,评估参观效果,并基于研究结果共同反思展览教育工作的连续性和衔接性,进而对如何以观众研究为基础构建展教协作机制进行总结、反思、改造和创新。

二、案例情境

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展项策划、内容设计、制作对接和运营均由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承担。这种“展教合一”的部门设置为实践共同体中的展览与教育一体性提供了支撑。该展览为长沙博物馆原创儿童展览,位于儿童区博乐园。展览面积120平米,主要面向5—12岁儿童,以长沙博物馆展示与典藏内容为基础,通过互动体验的形式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探究博物馆的台前幕后,激发儿童对博物馆和长沙历史文化的兴趣。展览分七个部分:“谁在博物馆工作”“博物馆有哪些宝贝”“它们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博物馆的宝贝藏在哪里”“文物医院”“宝贝们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的博物馆”^[20],各部分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

社会教育部在展览运营过程中,基于展览自主研发面向儿童的参观工作纸。该工作纸按照展览内容设置参观任务,辅助儿童参观学习。工作纸包含人口学变量信息(姓名、学校、年级、班级、日期、和谁一起参观),展览平面图以及结合展览七部分设置的12个问题,题目类型涉及选择题、填空题、问答

题、连线题(图1)。

该展览处于一个独立的空间,环境较为封闭,通常为预约制参观,分小学低年级段场和高年级段场,每场儿童观众15人(允许家长陪同)。参观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为教育员引领儿童进行团体导览式参观,结束后教育员发放工作纸,儿童在工作纸引导下完成第二环节自主参观。第二环节结束后,儿童将填答完成的工作纸交给教育员,进行小结。活动总时长约1小时。对于低年级段儿童,自主参观阶段要求会适度降低,鼓励家长陪同完成任务。

为了保证展览运营具有可持续性,社会教育部自2017年开始,每年持续在该展览收集儿童观众数据,为展览解说、教育活动运营与更新提供科学支持。展览2017年9月开放,同年10月启用工作纸导览模式。在学期内,主要在周末开放;在寒暑假,每周开放5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展览在2020年1月23日至6月下旬停止开放。此外,博物馆的管理、空间维护、大型活动等因素也会影响该展览活动日常运营。经统计,自展览开放以来,共有6957名儿童参观该展览,现场回收工作纸5157份(截至2020年底)。这些工作纸成为探索展教协同发展的基础。

三、案例中实践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本案例构建的实践共同体包含了博物馆和高校双方专业力量形成的研究团队,涉及展览、教育和研究三项工作(图2)。在共同体模式中,展览和教育工作服务于观众,而观众研究能够发现观众的参观规律并获得观众反馈,因



图1 “哇哦 博物馆”儿童展览参观工作纸

此观众研究可以成为促进“以观众为中心”的展教工作协同发展的有效媒介。在本案例中,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研究团队通过沟通、讨论、反思和实践,形成阶段性共享产品,为下一阶段共同体发展奠定基础,指明方向。

1. 阶段一: 前情分析

在任何一种文化情境中,实践共同体的构建都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长时间多方投入。在初期,身处实践共同体的机构和成员需要具有共享的、互利性的价值诉求,彼此对对方工作实践具有独特贡献,即建立在一定的联结基础之上。按照此原则,结合上述案例情境分析可以发现,本案例的实践共同体的形成依托了以下两个重要契机。首先,本案例涉及的博物馆和



图2 本案例构建的实践共同体

高校两个主体方通过前期合作，对彼此工作有一定的熟悉，这种熟悉让双方能够清晰意识到自身工作的优势、特长与不足，成了实践共同体中通过实践建立合作与共享机制的基础，也让每一个实践共同体具有独特的情境特征和文化特性。其次，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能够独立承担展览设计和教育活动的双重任务，为促进展教合一破除了部门壁垒。同时，该部门具备较强的研究数据收集意识，为案例中的观众研究工作储备了大数据支撑。

因此，在实践共同体构建初期，研究团队通过多次讨论，达成合作目标，分析工作困境，明确各自角色。合作目标：研究团队对儿童观众提问数据进行科学分析，评估儿童观众参观长沙博物馆“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效果，寻求展项及配套教育活动完善、改造、升级的

方向，并配合展览形成一系列附属科学研究产品和教育产品。工作困境：博物馆工作者的困难集中于如何基于工作实践开展科学研究（包含问题提出、研究设计、抽样方案、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并利用研究成果促进工作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高校研究者体现出对该馆具体工作情境了解不充分、不具备博物馆教育和策展实践经验两个不足。双方角色：基于对合作目标和工作困境的分析，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明确了各自的优势与独特贡献，形成互补型实践工作氛围。高校研究者为具体观众研究提供技术指导，博物馆工作者开展数据分析，双方共同进行数据释义。

2. 阶段二：共享资源

在前情分析基础上，研究团队经过数轮讨论，逐渐进入资源共享模式。在此案例中，资源体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由儿童提问形成的大数据库及相关数据分析技术等资源形态。在此阶段，研究团队明确了研究方案，包含分析样本抽样标准、数据分析原则，形成了数据分析结果。

（1）共同确定抽样样本

在儿童提问原始数据库中，数据海量，且具有一定的重复性，鉴于研究团队人力、时间有限，高校研究者提出建立科学的数据筛选标准，按照一定原则抽取分析样本框，在保证有效性的基础上，减少分析工作量。在科学的抽样原则指引下，博物馆工作者提供详尽的数据背景信息。由于每年10月份数据回收资料最为完备和丰富，因此研究团队选择了2017—2020年四个年份的10月份数据进行分析。这个时间段内，共743名儿童参观该展览（占总人次的10.7%），现场回收441份工作纸（占总回收量的8.6%），其中186份工作纸为有效回答。这186份工作纸构成了本案例的主要分析对象（表1），其中，来自二年级、四年级的最多，七年级最少（表2）。

表1 2017—2020年每年10月“哇哦 博物馆”展览参观工作纸回收数量统计表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数量（份）	67	64	42	13 ^①

① 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数据较前三年大量减少。经过数据分析发现，2020年的数据编码类型均能被前三年数据编码类型覆盖。

表2 样本所在年级统计表

年级	幼儿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缺失
频数	12	31	36	28	36	21	13	2	7
占比(%)	6.5	16.7	19.4	15.1	19.4	11.3	7.0	1.1	3.8

(2) 共同进行数据分析

如何将博物馆教育辅助资源作为观众数据的来源，并对其进行分析？具体到本案例中，如何将儿童完成的工作纸作为观众研究的数据来源，并进行科学地数据分析？这是此次研究团队在合作实践中遭遇的最大问题。经讨论，高校研究者提供数据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和分析视角，博物馆工作者实际操作数据分析过程，最后研究团队共同对编码框架和编码结果进行讨论。团队成员通过三个程序保证编码归类过程的

完整性、科学性和一致性。第一，在充分阅读了解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展览单元内容和问题性质，集体讨论确定编码标准。第二，对数据进行独立分析归类。第三，找出独立归类中存在差异的类别和问题，集体讨论，确定最后类别种类和类别中包含的问题。

经过数轮讨论，团队成员对数据结果达成一致意见，按照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对问题条目样本进行主题提取，并且对每种问题的频数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内容分析法的原则，研究团队按照自下而上的归纳式推理方式，对儿童提问进行客观系统分析，并按照儿童提问与博物馆是否有关、与博物馆存在怎样的关联两个原则进行编码，最终提取出的编码包含五个维度九个指标（表3）。

表3 按照提问内容对问题编码的结果

维度	释义	指标	频数	解释	举例	对应展项
世界	展览所处大时空背景	历史溯源	9	宇宙与地球的形成、大小，原始人的来源、外形、语言交流等问题	我们是怎么发现宇宙有多大的？ 地球是怎样形成的？ 原始人是从哪里来的？ 原始人用什么方式说话？ 博物馆里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时空轴展板，以图文方式介绍了从宇宙诞生、地球形成、生命出现、恐龙出现、人类出现、长沙出现人类活动痕迹到长沙城修建
		恐龙	29	恐龙形态、生存、灭绝，恐龙化石发掘、鉴定，恐龙挖掘体验与博物馆恐龙化石展陈	恐龙长什么样子？ 恐龙什么时候出生的？ 现在看得到恐龙吗？ 恐龙化石是怎样发现的？ (长沙博物馆)为什么没有恐龙化石？ 恐龙是怎样来到博物馆的？	时空轴展板、藏品征集来源展板、博乐园绘本《恐龙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
博物馆文物	博物馆展陈内容，藏品背后故事（如分类、年代、真假、价值、制作、使用途径等）	藏品泛知	21	博物馆文物数量、类别、年代及藏品之“最”	为什么博物馆里的文物那么多？ 博物馆里的文物是怎么分类的？ 长沙博物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博物馆里有哪些宝贝”展项

续表

维度	释义	指标	频数	解释	举例	对应展项
博物馆文物	博物馆展陈内容, 藏品背后的故事(如分类、年代、真假、价值、制作、使用途径等)	藏品具体认知	22	博物馆文物的命名规则、外观、材质、制作过程、功用、真假判断、价值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文物叫什么名字的? 湘绣是用什么绣(绣)的? 博物馆百分之多少是真品? 这个符号代表什么? 屋顶为什么要有瓦当? 每件文物的朝代都是如何判断的?	“博物馆里有哪些宝贝”“博物馆里的宝贝是做什么用的”两个展项, 第二个展项有瓦当残片的拼接复原
博物馆工作	藏品征集、考古、保管、保护等	藏品征集	8	以“文物”为主语, 寻求博物馆藏品的多样化来源渠道	文物怎么来的? 化石怎么来的? 博物馆的东西是否可以拍卖? 为什么不能买(博物馆里的)宝石?	“博物馆的宝贝是怎么来到博物馆的”展示单元, 包括藏品来源图文展板和“考古都做些啥”展板
		考古	30	考古本质、价值、过程与工具、发现成果、考古体验等	盗墓者会考古吗? 文物为什么要挖掘出来? 怎么探秘海底沉船? 刚挖掘出来的物品怎么保存呢? 怎样才能当考古学家?	考古发掘坑、“考古都做些啥”展板、以龙窑为元素的考古主题空间布置
		藏品保管	8	文物保管的价值、工具、方法等	为什么需要保管员? 文物是怎么运输的? 怎么搬运的? 文物柜里的湿度和温度不知道准不准确?	“博物馆的宝贝都藏在哪里”展示单元, 包括藏品柜、示范藏品与囊匣教具、温湿度计及藏品保管图文版面; “谁在博物馆工作”展项, 有保管员工作场景图
		文物保护	55	文物复制, 文物安全, 文物面临的伤害与危险, 文物修复方法、操作、过程	为什么有的器物需要复制? 在土里的铜器会被氧化吗? 晚上考古地点出现了火灾, 应该怎么救文物呢? 纸质文物怎样修复? 如果一个瓷器缺少一块, 但是找不到怎么办?	“文物医院”展示单元, 包括“变形记”文物修复前后比较展项、“文物怕什么”展项、“铜壶就诊记”图文版面以及文物拼接修复体验展项
其他	与展览无直接联系	其他	8	博物馆里的一般展览、传播、管理、志愿者工作	博物馆现在展览的是什么? 如何策划一场展览? 博物馆为什么不收钱? 为什么建设博物馆?	—

3. 阶段三: 共同释义

基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 研究团队希望进一步了解数据对博物馆展教实践的意义与启示。由高校研究者提供数据解释的思路, 并监督这个释义的边界与合理性, 博物馆工作者主导, 讨论数据

结果对“哇哦博物馆”展览涉及的展教工作的实践意义。

(1) 儿童提问对改善“哇哦博物馆”展览设计的启示

通过分析儿童提问与设计者既定参观目标之间的差异性, 研究团队明确了“哇哦博物馆”展览升级的两个可能方向。

首先, 寻找空缺。将表3与“哇哦博物馆”展陈目录对比发现, 儿童提问的所有指标类型均能找到对应展示设计, 但是, “我们的博物馆”单元没有在儿童提问中得到体现。基于

数据分析结果，博物馆工作者返回展览现场进行反思，推测可能由于这个单元布展位置相对独立，展出内容本身导引与启发不够，现场教育人员导引不足。此外，儿童对藏品保管问题提问相对较少。藏品保管是很重要的工作，在现场检查中，博物馆工作者发现，一方面保管部分相关的版面在展柜的侧面，相对比较隐蔽，另一方面参观导引设计可能存在问题。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参观场次没有打开藏品柜进行藏品教具示范教学。由此看出，观众研究结果对于检测展览设计和实际运营存在的偏差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其次，寻求突破。数据显示，儿童的提问基本来源于展陈主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儿童通过参观该展览产生了有意义的知识建构，也有可能促进儿童在展览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有意义的联结。例如，在文物考古部分，有关考古方法、操作等实践性问题最受儿童关注，同时他们对考古的概念和原因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直接接受考古的必然性。此外，部分问题儿童或家长平时应该已经了解（如洛阳铲、海底沉船、古墓机关、分金定穴等），这些是展览设计初期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数据结果为下一轮展示改造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创意源泉。

（2）儿童提问对改善“哇哦 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活动的启示

经过讨论，研究团队发现数据分析结果揭示了儿童在参观后存在一定的认知规律，对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升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首先，儿童存在多元的关注点。有一段时间展览中的一件青铜鼎修复体验教具因为损耗，一只耳朵被送去维修。

在现场体验中，儿童完成拼接任务时发现缺了一块。他们非常关注这一块缺失。这是突发事件，并非展览策划之初以及教育活动之初设计的环节。这提醒博物馆教育者需要有多元的视角、开放的心态、敏锐的观察，以及丰富的知识储备来寻找有趣、科学的教育衔接点。

其次，儿童追求故事的全面性。儿童所提问题显示，他们的关注点不局限于藏品现状，他们对藏品的历史来源、因果关系、操作过程等也有兴趣。例如关于瓦当的问题有“屋顶为什么要有瓦当？”“瓦当是做什么用的？”“瓦当残片为什么有的有花纹呢？”“那些花纹代表了什么？”等。这提醒博物馆教育者后续可以设计关于瓦当藏品的专场教育活动或准备相关教育材料以满足儿童的学习兴趣。

再次，儿童期待藏品的“冲击力”。多名儿童所提问题都用了“最”字，例如，“世界上最强大的恐龙是什么？”“（长沙博物馆）最著名的展品是什么？”“长沙博物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物是什么？”“石器最怕什么？”等。这反映了儿童对极端化和个性化现象与物件的好奇。“最”体现了这个现象或物件的独特性与唯一性，非常具有冲击力。在后续展览活动中，博物馆教育者可以通过这类问题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进行深度探索。

最后，儿童有特别的兴趣点。恐龙是儿童的重要兴趣点。虽然“哇哦 博物馆”展览仅有少量内容涉及恐龙，而且长沙博物馆作为城市历史博物馆，并没有展出有关恐龙的藏品，但是儿童有关恐龙的提问频率在九个指标中排名第三。由此看出，儿童极希望博物馆参观能够满足其个体的兴趣。对于教育者而言，可以在充分了解儿童兴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与儿童连接的话题或内容，吸引儿童关注，帮助理解，也可以考虑以其他方式适度对儿童兴趣点拓展。

4. 阶段四：共谋发展

经过共同释义，研究团队结合儿童提问、展览及配套教育实践情况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描述、对比、寻找普遍性、发现独特性等多元视角，为促进展览升级、改进配套的教育活动提供了方向，在前期共享资源和共同释义的基础上，下一阶段研究团队的工作各有侧重，提供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对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而言，前期合作共享模式让团队逐步形成问题导向意识和研究引领实践意识，将静态展览设计和动态教育实践相融合，以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思维促使展览更

符合儿童的需求,让教育活动提升展览品质,是展教融合的一次有效尝试。团队充分反思、深入分析现有展示以及现有教育活动的不足,并在儿童提问的启发下,推出配套绘本《哇哦,博物馆!》(图3)。绘本根据儿童参观展览后的提问规律,选取儿童关注的、有价值的、在现有展览中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以符合儿童认知水平为标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回应。绘本的原始素材来源于案例中的数据分析成果,是现有展览的补充,也可以作为后续教育活动创新的蓝本和辅助材料。除绘本外,长沙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也有意识地根据研究成果对教育活动环节进行调整,并着手寻求更多的展览诠释方式。即便当



图3 《哇哦,博物馆!》绘本

前该展览已处于运营阶段,不会进行大的调整,但展览的局部维护及升级计划都可以参考研究成果。此外,虽然这一展览的策展与教育运营皆为同一个部门,但是策划与运营并非同一批工作人员,因此观众研究的成果能够促进博物馆工作者对观众形成共识,促进相互理解与工作的有机融合。

对高校研究者而言,通过本次合作开展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尝试建立双方实践共享机制,并在实地工作情境中理解什么是能够促进博物馆展教实践发展的“真研究问题”。这种真问题应该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扎根于博物馆工作实践,尊重博物馆发展的复杂社会氛围(如组织机构特征、公众参展普遍素质,以及社会文化环境)。从发展性视角来看,虽然儿童的认知、生理、心理等均存在年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但目前并未深入分析每个年龄段儿童关注点的差异。在后续研究中,可以按照年龄、性别等变量进一步深入分析儿童所提问题结构和内容内容的差异,为促进展览设计和教育实践的融合、开发大众化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进一步提供素材和方向。

四、启示

本案例探索了一个由博物馆工作者与高校研究者通过构建共同体、合作开展观众研究、寻求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协同发展的有效模式。据此形成的实践共同体从构建到发展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形成了一定成果,逐步促进了共同体成员的相互理解、资源分享、信息流通、技术交互、共同体实践思维的塑造、专业语言的形成,明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表4)。

表4 本案例中实践共同体发展阶段总结

阶段	实践活动	合作内容	成果
一、前情分析	讨论、对话、反思	达成合作目标; 分析工作困境; 明确双方角色	为下一阶段研究计划奠定基础
二、共享资源	讨论、数据分析、对话	确定研究框架; 形成分析标准; 开展数据分析	发现儿童提问的类型、种类及频率
三、共同释义	实地考察、文献阅读、讨论、对话	根据相关理论和博物馆实践工作,阐释数据的现实意义	发现儿童提问的规律和模式,发现儿童参观效果和展览设计效果的差异性
四、共谋发展	写作、讨论、反思、设计	基于研究开发活动产品,确定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形成绘本,调整活动环节,为后期维护、展教工作的升级改进提供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例的观众研究是以“哇哦 博物馆”展览的儿童提问为研究对象，因此此项观众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情境适用性。但是，如何依托高校研究力量形成展览、教育和研究的共同体工作模式却具有较强的推广性。这种共同体模式依托观众研究的媒介作用，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对观众形成共识，并基于共识对展览教育工作进行改进，让展览和教育工作能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案例切实体现出在博物馆工作中研究和实践能够协同发展的机制，并形成以研究支持和融合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从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中寻找真研究问题的互动促进模式。这是对改变当前观众研究与展教工作相分离现状的一种突破性尝试。在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我们发现以观众研究为媒介促进博物馆展览教育实践协同发展至少需要具有以下三点元素。第一，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成员需要对共同体发展目标形成一致认识。在本案例

中，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双方均认同观众研究在博物馆展览教育工作中的潜力与价值，并且有通过共同合作改善博物馆展览教育的强烈意愿。这样的共识为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共同体载体。共同体构建需要选择具有可操作性、包含亟需解决的问题、具有前期工作基础的观众研究项目作为载体，为成员的合作共建和专业化成长提供素材。在本案例中，长沙博物馆前期积累的儿童观众大数据为本次共同体构建打下了基础。第三，共同体机制。共同体成员在持续的互动、对话、沟通过程中，需要明确双方的共享和界限，需要遵守科学研究伦理道德准则，需要建立具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工作规划，双方需要投入必要的时间保证。总之，成员需要共同制定和遵守维持共同体发展的规范。

在当前博物馆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因素，展览设计与教育实践大多处于分离状态，造成了展览设计人员不懂教育，教育人员不懂展览的局面。在机构合作中，也存在博物馆工作者不懂观众研究，现有的观众研究对博物馆实践工作缺乏指导意义的问题。本案例所描述的博物馆工作者和高校研究者通过遵循共同体原则探讨研究、展览和教育的有益尝试，证明了这种共同体理念能够让观众研究具有深度和针对性，进而有效促进展教合一，并进一步提升博物馆工作的专业水平。因此，我们呼吁构建集研究、展览、教育为一体的实践共同体机制，以促进博物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陆建松. 博物馆展示需要更新和突破的几个理念[J]. 东南文化, 2014(3): 98-101.
- [2] 郑奕. 论教育工作者在博物馆策展团队中的作用[J]. 东南文化, 2013(5): 110-116.
- [3] 潘晴. 建立展览部门与公教部门的合作机制[J]. 美术观察, 2016(2): 8-9.
- [4] LAEV J, 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 王文静. 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研究述评[J]. 全球教育展望, 2002(1): 51-55.
- [6] 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social learning systems: the career of a concept[M]//BLACKMORE C ed. Social learning systems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s. London: Springer Verlag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2010.
- [7] HARRIS S R, SHELSWELL N. Moving beyo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adult basic education[M]//DAVE B, TUSKTING K ed. Beyo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anguage, power and social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 [8] LESSER E, STORCK J.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IBM systems journal, 2001(4): 831-841.
- [9] 黄晓林, 黄秦安. 实践共同体(CoPs)中教师学习的角色冲突与教师专业发展扎根理论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21(1): 86-92.
- [10] 张家军, 王月. 活动理论视域下教师专业实践共同体的构建与实现[J]. 当代教育科学, 2021(12): 49-57.
- [11] 邱德峰, 李子建. 教师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及优化策略[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2): 53-58.
- [12] ASH D, LOMBANA J. Reculturing museums: working toward diversity in informal settings[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13(1): 69-80.

- [13] BAILEY E B. Researching museum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their roles, identit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06(3): 175-197.
- [14] CASTLE M C. Blending pedagogy and content: a new curriculum for museum teachers[J].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06(2): 123-132.
- [15] KELLY L-A D. Action research a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zoo educators[J]. *Visitor Studies*, 2009(1): 30-46.
- [16] ASH D, LOMBANA J, ALCALA L. Changing practices, changing identities as museum educators[M]//*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s at science centers and museum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23-44.
- [17] TRAN L U, KING, H.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useum educators: The case in science museums[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7(2): 131-149.
- [18] Ji J. *Understanding science museum educators in China and their self-concept as professionals*[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 Canada, 2015.
- [19] 季娇, 游春艳. 构建学习共同体: 一位科技馆教育者和一位科技馆教育研究者的对话[J]. *中国科技教育*, 2015(6): 6-7.
- [20] 刘晴贤. 迈向儿童友好型博物馆[N]. *中国文物报*, 2018-11-30(8).